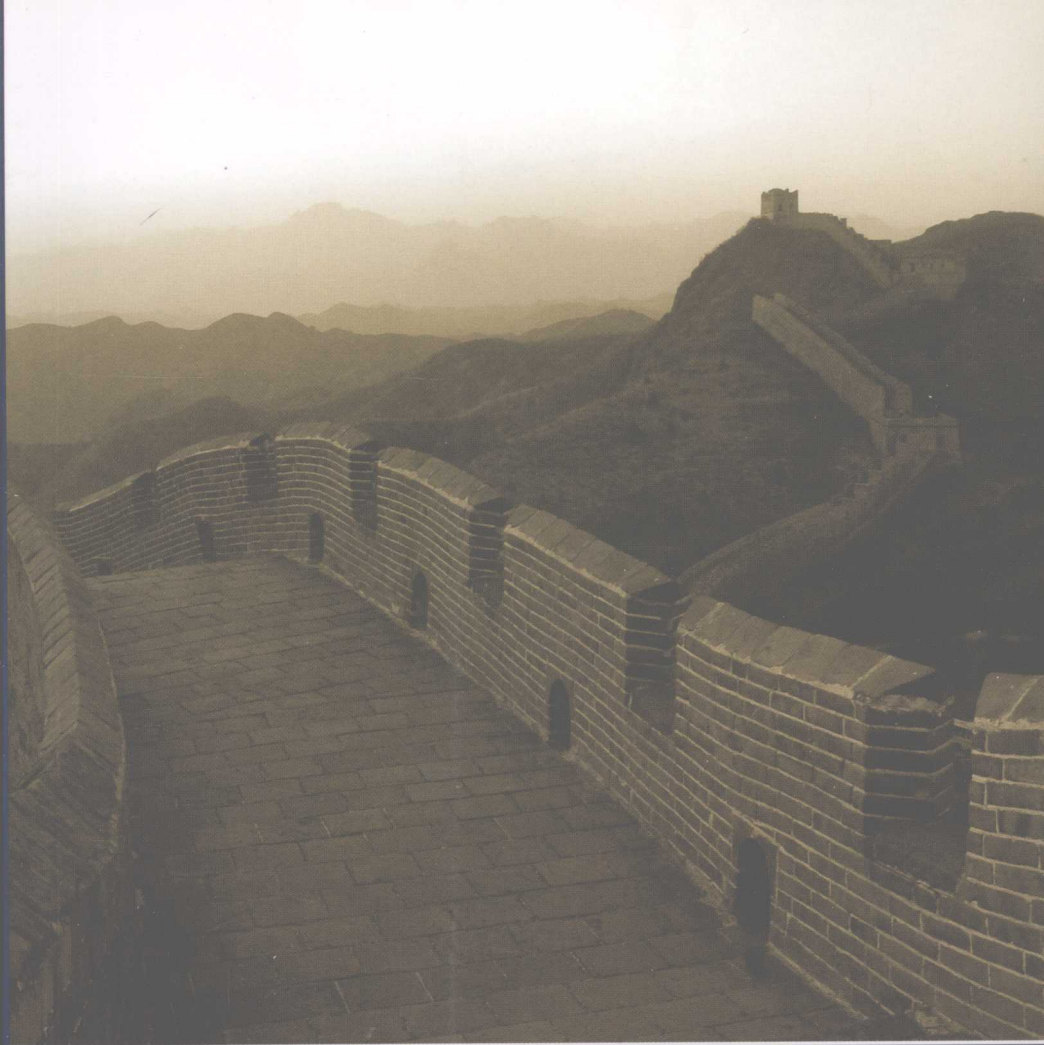




民族魂

MINZUHUN

——教科书变迁

汪家熔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民 族 魂

——教科书变迁

汪家熔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魂——教科书变迁/汪家熔著. —北京:商务印
书馆, 2008

ISBN 978 - 7 - 100 - 05522 - 2

I. 民… II. 汪… III. ①教材—编写—教育史—
中国—清后期~民国 ②教材—出版发行—文化史—
中国—清后期~民国 IV. G423.3 G23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222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MÍN ZÚ HÚN

民 族 魂

——教科书变迁

汪 家 熔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瑞 古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05522 - 2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7%

定价: 16.00 元

献 给

教科书之源商务印书馆创建 110 周年

(1897 年—2007 年)

序《民族魂——教科书变迁》

吴 道 弘

在最近二十多年里,我国出版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个可喜现象是,出版史的研究对象,一部分研究者逐步摆脱了过去图书史的影响,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科学内容。在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上,充分肯定了研究个案的重要性。由具体专题(实例)研究入手,需要拥有大量文献资料,从中找出新的认识,增进对出版与社会和文化的理解,揭示出版与社会和文化的联系及其意义。因此,强调出版史的文化内涵,视出版史为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是大部分研究者的共识。尽管学界对出版的起源和发展、在出版史的分期等问题上,存在各异的理解,有不同的表述,这大致是人文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

无论如何,这几年出版史专题研究(包括出版人物研究)的论文、专著的不断出现,确实是令人高兴的。汪家熔先生这本研究我国近代教科书的变迁、发展的专题著作出版,无疑就是新的例证。

家熔早年从事印刷,长期服务商务印书馆,熟稔图书目录学,尤其钻研近代图书出版文献,孜孜以求,家藏亦丰。这既是他研究我国近代出版历史的起点和基础,也为深入研究提供了极好的条件。我认为,这对于出版界同人着手出版史研究,也是可以得到启

示的。

这部以《民族魂——教科书变迁》为题的新著，撷取了自晚清教科书起到民国各科教科书为研究课题，这是近代出版历史上的重要现象，对研究我国近现代出版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作者显然不满足一般书史的简略叙述，而又坚守“研究出版史个案，必须见到书（实物和文献史料）”的治学原则。通过大量发掘文献史料，进行爬梳整理，加以研究，得出新的认识。值得重视的是，作者对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一·二八”事变轰炸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真实原因，以及日本侵略者在整个事变中的真正用心进行了揭露，目的就是企图转移国际舆论，掩盖它建立东北傀儡政权，独占我国东北的卑劣手法。他从日本有关文献中找到有力的材料，在书中揭示出确凿的证据，作了令人信服的阐述。同时书中用《出版家王云五》一节，对作为出版家的王云五集中作了评述。特别写他在日本帝国主义干涉我国教科书内容时的大义凛然、毫不屈服的精神。充分肯定了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的作用。从未见到有人提出过类似提法，应该说，这是实事求是的评价。

我与家熔同为出版界人，订交已经二十多年了。最初他曾为我提供研究资料，对我研究图书评论工作帮助不小。在我学习、关心我国出版史研究以后，读过家熔不少有关研究文章，了解日增。特别1990年代在出版家宋原放先生主持编纂十卷本《中国出版史料》时，曾与家熔有过更多的接触和合作。六年以前，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持启动《中国出版通史》研究编纂工作，又有增进了解和互相交流的机会。深感家熔沉浸在近现代出版史的研究之中，从不畏惧搜书求书之劳，其思考之勤也几乎达到痴迷的程度。这种感情的投入，有时容易情绪激动，即使偏激，也是他真诚自信的

表现。他说过,搞出版史不见到书(实物和文献史料),是绝不能取得“真经”的。这使我想起赵元任《忆寅恪》一文所记,陈寅恪当年在清华国学院常对人说:“你不把基本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家熔研究我国近现代出版史的学术途径和治学方法,总是以史料为依据,做到论从史出。可以说,他是一位研究能耐得寂寞,又有学术勇气的出版史研究者。

此刻我又禁不住想起,1998年初出版家王益前辈曾为家熔的出版史研究文集写的序。在这篇题为《重视出版史的研究》序文里,王老指出家熔研究出版史的几个特点:

“首先而且主要的是勤奋,他腿勤、手勤、笔勤、脑勤。他的《二十四史的250年版本史》一文,比较了1784—1989年间出版、能找到的31种版本的二十四史,论断解放后中华书局不轻信最早、而使用各史最好版本作底本,又由各史专家依各种版本校勘并出校记,汇历代成果于一炉,是最优秀的版本。说明了社会主义出版工作的优越性,从而否定了片面强调‘书贵初刻’的佞宋出版家。他花了多年时间,终于在旧燕京大学藏书中找到了出版于1815年至1823年、大开本4800余页的马礼逊《字典》,从而可以原原本本地介绍该书的内容、蓝本、印刷诸问题,原来流传的诸多不实之说得以澄清。他第二个特点是求真务实,不轻信人言,遇到值得怀疑的问题,敢于提出商榷,力求水落石出弄清事实。……第三,他的文章史料丰富,但不是简单地堆砌史料,常常有客观的分析……这些都是史学工作者必备的品质,很宝贵的。”(见《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4 序《民族魂——教科书变迁》

家熔嘱我为他的新著写序，恭敬不如从命。现在特地抄录王老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相信王老也会首肯的。

2006年9月10日

教育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决定了我国漫长艰辛的近代进程中,普及教育以提高全民素质的活动,具有重大意义。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是互为因果,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中,教育是近现代进程众多环节中最不可或缺、也是最艰巨的一环。而普及教育,教科书是极关键的。

目 录

序《民族魂——教科书变迁》	吴道弘
上编 晚清教科书	1
第一节 对教育的艰苦认识	1
第二节 对教科书的认识	7
第三节 非学制教育读本	8
一、非学制教育读本	8
二、教会低级学校读本	9
三、拒绝教会读本	11
四、仁人志士的事业	12
第四节 壬寅学制后新式基础教育的课本	19
一、辛丑“新政”和壬寅学制	19
二、壬寅学制时的课本状况	21
三、混合课本	24
第五节 癸卯学制后新式基础教育的课本	25
第六节 废除科举后的学校课本	28
一、中国图书公司的失败	29
二、学部图书局	30
三、学部审定课本情况	35
第七节 结合国情的借鉴	37

一、借鉴外国	38
二、结合国情	42
第八节 三套有影响的课本	45
一、《蒙学读本全书》	45
二、《文学初阶》	51
三、全套的中小学《最新教科书》	55
四、生字重复率	63
五、文以载道：平等观及其他	65
第九节 国文教科书	68
一、国文课是出版者给予的主课地位	68
二、直面社会	75
第十节 修身教科书	76
一、历史过渡时的伦理思想	76
二、修身教科书原理	83
三、修身教科书概况	86
四、几种值得注意的修身教科书	94
第十一节 商务印书馆两位重要人物	100
一、张元济	101
二、高梦旦	106
三、《辞源》	108
四、《新字典》	110
下编 民国时期的教科书	115
第一节 陆费逵和中华书局的诞生	116
一、被毁坏声誉的陆费逵	116
二、认识陆费逵要从 1906 年开始	121

三、中华书局的创立	125
第二节 民元的两套课本	131
一、国文教科书	131
二、修身教科书	136
第三节 课程标准开始主导教科书	139
一、蔡元培的教育宗旨	141
二、袁世凯的尊孔即“尊袁”宗旨	142
三、提倡国语和标点符号	147
四、与学制相关的规定	149
第四节 常识科课程标准及教科书	151
一、民国元年修身科课程标准	152
二、《特定学务纲要》的修身科课程标准	154
三、1922 年修身科开始改称	154
四、1929 年变为社会科、公民科	155
五、民国元年出现过的“修身作法”	161
第五节 语文科课程标准及教科书	163
一、1912 年国文科课程标准	163
二、1922 年国语科课程标准	165
三、1932 年国语科课程标准	167
四、1936 年国语科课程标准	175
五、1941 年国语科课程标准	175
第六节 常识、社会科课程标准及教科书	176
第七节 其他各科	177
一、算术科	177
二、卫生体操唱歌科	178

4 目录

三、图画科	179
四、手工科	179
五、历史科	180
六、地理科	180
七、理科	180
八、英文科	181
第八节 “为国难而牺牲”	181
第九节 出版家王云五	195
一、进入商务印书馆前的王云五	197
二、胡适推荐王云五	198
三、出任编译所长	203
四、“编著书籍当激动潮流”	203
五、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早期贡献	206
六、王云五离开商务印书馆的原因	209
七、科学管理的成绩	212
八、用调节利益增加图书品种	216
九、抗日战争中的商务印书馆	217
十、大学教科书的出版	224
后 记	226

上编 晚清教科书

第一节 对教育的艰苦认识

鸦片战争,特别是中法战争后,人们对吏治腐败的思索是从官吏选拔、检讨科举制度开始的。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王韬在《原才》、《原士》、《变法》等文章中提出废除科举是变法中第一要事,但和稍后提倡变法诸人一样,也没能提出废科举后如何得到知识分子和现有读书人的出路问题。触及教育、谋求教育变化且成为风气,则在甲午之后。

最早是甲午战败后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新正,严复在天津和夏曾佑等人合办《直报》,连续发表五篇救亡文章;1895 年 5 月 1 日至 8 日的《救亡决论》上指出:“救之之道当如何?曰: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①指出当时文化为少数人垄断:“中国以文字一门专属之士,而西国与东洋则所谓四民之众,降而至妇女走卒之伦,原无不识字知书之人类。”^②又介绍斯宾塞的理论:社会已经到了知识决定的年代,而且“各国皆知此理,故民不读书,罪其父母。日本年来立格致学校数千所,以教其民,而中国忍此终古”^③。应

① 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 1 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43 页。

② 同上书,第 42 页。

③ 同上书,第 48—49 页。

该说这是甲午战败后读书人痛定思痛最早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的言论。

接着,黄遵宪在年底将早已刻好的《日本国志》发表,^①他在书里说,到明治九年,日本全国人口 34338404 人,^②学龄儿童为 5251807 人,其中就学的就达 2094298 人,内女生 567392 人。^③政府筹措财政,每年拨付教育经费 5363870 元,另有公费学校公积金 752 万元,每年的子金 827000 元,补助金 545004 元;^④并且规定“取士官人之法,则不系乎此”^⑤。这种介绍日本普及教育后国力强盛,又 18 年,甲午就将我国打败的经历,显然有着极大冲击力,成为读书人关注的题目。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天津条约》规定了英语、法语在外交文书中的地位,1862 年据而开办同文馆。到光绪末年,清廷开设与传统教育方式不同的、单科训练班性质的外语学堂 8 所、水师学堂 7 所、武备学堂 18 所、兵工学堂 2 所、路矿学堂 8 所,共 43 所。人们一直误认为这就是“西式教育”,并寄希望于这类机构的发展。上述 43 所学校相当于现在中等专业学校,培养清廷新的政治、军事的初级官员。在《清史稿》中,记述这些学校的文字列入《选举志》,确切地说明了它们的性质。学生入这些学校为的是做官;学校相

① 刘雨珍在《日本国志》前言中讲“日本国志的正式出版大约在光绪二十一年底”,见黄遵宪:《日本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9 页。

② 黄遵宪:《日本国志》(第 15 卷),《户籍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1 页。

③ 同上书(第 33 卷),《七大学区学事统计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48 页。

④ 同上书(第 33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48 页。

⑤ 同上。

当于培训班,没有上下衔接学校,生源缺乏科学知识,因而成就有限。这些学校的腐败等同衙门,与社会隔离,因此办学几十年,对社会发展没起影响。所以甲午后,其办学成绩成为人们考虑的中心:为什么这些教育机构没有出人才,梁启超说“其不能得异才何也”^①。人们慢慢感觉到关键在没有与之配套的次一级教育。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所叙日本义务教育制、学制以及经费保障;文中所述日本学校数和在校人数,以及女教员数和女学生数,等等,^②都是我国读书人闻所未闻的。正值甲午战败之后,中国被其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所打败,黄遵宪的书受到大家重视。梁启超读后半喜半责地说,读了该书才“知日本之所以强”,又责备书出版太晚:“乃今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③《日本国志》经过《时务报》的宣传和代销,加以梁启超在发行万余份的《时务报》连载的《变法通议》中提出兴学校,普及教育的意义被更多人士所接受。此时,民间已知仅仅办理同文馆之类不足以强国,开始看重基础教育。这时“开民智”已成为先进人士的共识。甲午战败时林纾写《闽中新乐府》,其中《村先生——讥蒙养失也》一首有“村先生,休足恭:莫言芹藻与辟雍,强国之基在蒙养。儿童智慧须开爽,方能凌驾欧人上”^④句。——寄希望于对下一代的教育。

① 梁启超:《变法通议》,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② 参见广东富文斋本该书第33卷,第7—13页,署光绪十六年版。

③ 梁启超:《日本国志后序》,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页。

④ 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1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戊戌变法时,学校也成为议论的题目,政变后民间仍然在办“洋学堂”。严复在戊戌政变后说的极具代表性:“自客秋以来,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仰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①——强国理想寄希望于民众素质的提高。

进入 20 世纪,对教育的关怀进入另一层次,即研究教育。1901 年 4 月,罗振玉创办《教育世界》半月刊,连续达 7 年之久。这是我国历史上对教育的最早的系统研究。该刊以介绍东西方各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为主,并发表有见地的国内人士的意见。这时,人们开始觉得人才教育不可寄托:1902 年 1 月张元济在该刊发表《答友人问学堂事书》。其中一条说:办学“勿存培养人才之见。非谓学堂不足以育人,然念念在育才,则所操者狭而所及者浅”^②。20 世纪初开始的研究得到的这个结论,实质是确立了普通教育的观念。

一个正常的国家,教育处在正常状态的国家是能理解的。对一个有强大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反动派联合统治的国家,需要的是解放斗争,教育应该处在什么地位? 中国人民面对的是强大和根深蒂固的反动统治,不是一朝一夕能推翻得了的。同时,几千年首先考虑自己的小农意识的民众思想还需提高,需要长期斗争才能获得解放。在解放斗争中,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条件,民众素质的

① 《严复集》(第 3 卷),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525 页。

② 张元济:《答友人问学堂事书》,《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170 页。